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演进逻辑及中国应对策略

李喜梅,王健康,刘建江,禹璐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美贸易关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大动荡。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是以经济制裁为手段,以中美经济结构差异为着手点,精准打击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和不具备优势的高新技术行业,再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全方位且持续性地对中国展开战略攻势,旨在延缓甚至遏制中国走向复兴道路。为此,需要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来夯实自身基础,应对冲击;需要谋求更好的中美合作应对美国政府的“脱钩”与对抗;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推进新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演进逻辑;战略举措;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F752.7;F75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3-0113-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3.014

Evolutionary Logic of American Trade Friction towards Chin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LI Xi-mei, WANG Jian-kang, LIU Jian-jiang, YU L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rump administration's trade protectionism has brought a huge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which has also caused great turbulence to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and order.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pplying mainly economic sanc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s Sino-US trade war putting hands to the diversity in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n precisely attack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ts high-tech industry without advantages. Sequentially US launches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strategic attacks against China from politics, milita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iming at delaying even containing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juvenation. Therefore, China is expected to consolidate its own foundation through adhering to deepening overall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o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to strive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ith America to deal with American government's "de-connection" and confrontation, and to initiate "the Belt and Road" to accelera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 Trump administration; evolutionary logic; strategy; Sino-US relation

收稿日期:2020-0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攻关项目(17JZD022);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9YBA003)

作者简介:李喜梅(1963—),男,湖南涟源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等研究。

一、前言

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都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实施“美国优先”的工具。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时期,美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为美国经济的全球扩张提供持续的超额利润。在世界经济衰退市场萎缩或美国自身经济不景气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抬头。特朗普政府启动的对华贸易摩擦,逐步演变为针对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全球贸易摩擦,美国也蜕变为“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推动者。2018年3月,美国以巨额的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发动了全面的贸易摩擦,中方有理有据积极回应,对美正面采取对等的加征关税举措,中美贸易摩擦拉开序幕并不断升级^[1]。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动的贸易摩擦不仅体现了其经济上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更从政治、科技、文化和安全等方面表现出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焦虑与不安,担心中国的崛起动摇已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损害美国国家利益^[2]。

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演进

只要存在贸易,就可能出现贸易摩擦。而2018年以来出现的中美贸易摩擦,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广度与深度,并且从一般的贸易摩擦向全面贸易摩擦方向演变。

(一)美国单边挑起对华贸易摩擦

美国多次以各种借口,无端地向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关税。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2018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披露“232调查”结果,认为钢、铝的进口现在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18年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铝箔产品厂商征收48.64%至

106.09%的反倾销税,以及17.14%至80.97%的反补贴税”。2018年3月8日,特朗普政府正式签署关税法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同年3月23日,美国USTR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关于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及中方应对措施公开征求意见,拟中止对美国实施实质相等的减让和其他义务,即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同年4月1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约30亿美元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自4月2日起实施。4月4日,中国就美国发布对华“301调查”项下征税,建议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磋商诉求,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的范围不断扩大

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从一开始只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关税,扩大到与经济有关的各个方面:连续15年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阻止中国移动向美国电信市场提供服务;将44家中国企业(所涉单位多为我国军工科研单位)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实施技术封锁;指责中国企业使用各种手段从美国获取技术,并在很多情况下获得中国政府的支持;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还在继续;基于美国国内法律,而非世贸组织协定和多边规则对中国在WTO履约情况进行指责;回应中方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时,指责中方出尔反尔;未来7年,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将华为、中兴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之外;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违反了《制裁伊朗法案》,要求加拿大将其拘押,后又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禁止美国通讯企业一切被控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进行商业交易;如此等等。

(三)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扩展领域

美国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从与经济有关的各个方面,逐步升级到经济以外的领域。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不限于经济利益),美国实施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组合拳,使贸易问题政治化,制造地缘政治问题等,中美双边关系趋于恶化。整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摩擦逐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使得对华贸易摩擦演变成全方位的冲突。

(四)中美双方多轮磋商取得阶段性进展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违反中美两国关于通过协商克服贸易分歧的行为准则,危害两国利益,损害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来培养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并且威胁到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广泛期许。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中国也做出了两手应对准备,努力化解贸易冲突。

自2018年5月以来,截至目前,中美双方总共举行了13轮磋商,其中2018年4轮,2019年9轮,最后一轮是2019年10月10日至11日。每一次磋商,中方都坚持在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彼此的关切问题进行妥善解决,以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在进行第13轮磋商时,虽然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并在农业、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也未见实质性的成果^[3]。

直至2019年12月13日,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年1月16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双方达成一致,美国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

三、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单边行动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

不仅是美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更有其政治、经济层面的战略目标。纵观整个美国对华战略安排,发动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个手段。美国政治幕僚从战略、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采取了系列的遏制举措。

(一)美国调整对华整体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政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与过去外交模式不同,不再强调与中国“接触”——即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逐步渗透并改造中国的制度喜好和内外政策,转而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选择与中国开展“竞争”和“对抗”,防止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可能“挑战”和“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

第一,美国对华由接触战略为主导转向遏制战略为主导。自中美建交以来,接触政策一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主线^[4]。对于过去的美国政府、学术界和商界来说,与中国“接触战略”的内容和目的一直很明确:那就是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与中国开展必要的、可能的合作,让中国更加熟悉、理解和接受国际规则,使中国“融入”世界,“融入”在过去的100年里,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和“规范”^[5]。反过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经历了“积极的变化”,中国将谋求扩大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点,扩大与其合作,避免摩擦和冲突。这样的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伙伴”“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参与者”,帮助解决世界问题,避免危险,而不是像美国和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成为世界上一个“问题”和“危险”。

但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国内质疑“接触战略”的声音逐渐抬头,美国认为从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中,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用零和博弈思维来看就是美国吃亏了,且在和美国交往过程中,中国表现出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满,试图修正、改写既有规则,甚至想要将美国排除在贸易规则之外,另起炉灶。不仅如此,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十分保守,没

有出现美国所希望的经济和政治变化^[6]。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同中国的“接触战略”无法继续下去,2011年11月,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提出了“转向亚洲战略”,积极推进落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想要通过强化巩固与亚太军事盟友及安全伙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保障美国强权主义^[7]。

事实上,“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更多地介入到“平衡”和“预防”行动,挑起中国的南海争端。但奥巴马当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重点,仍在寻求与中国在经贸、教育、交流、气候等方面的“接触”与“合作”,其中包括“十万强计划”,史无前例地多次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十年来大规模加强两国社会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奥巴马自己也一再承认,“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针对中国,相反,谋求深度的合作才是该战略的主旨。

第二,全面开启对华“遏制战略”。特朗普上任后,对华接触政策的“前提”和“依据”已经受到严重质疑,因此他将对华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其基调转变为“制衡”和“脱钩”为主,“接触”与“合作”为辅。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以一种破坏其他国家主权,收集和使用特大规模数据的方式扩大其权力,传播专制制度特征,在美国背后建立一支强大的、科技密集的军事力量并扩大其多样化的核武库。并且,中国还试图削弱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并提供另一种威权主义模式;再者,特朗普明确指出,经济安全便是国家安全,中国对美国知识所属权和高新技术的“偷窃”是对其进行“经济侵略”和“不公平贸易”。特朗普政府要求收紧中国对美国进行技术投资的规模和力度,打击一切可疑的技术转移和网络经济活动,保护美国的知识所属权,维持其领先的竞争优势^[8]。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对中国描绘夸大其词,直指中国是将颠覆现状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全面挑战美国的权力、利益和影响力,目的在于重塑亚太地区秩序和削弱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二) 试图全面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是无视WTO规则,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大行贸易保护政策,剑指“中国制造”和“一带一路”倡议,意图借机遏制中国在制造业既有优势上的升级以及与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的分工与融合,从而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9-10]。

第一,试图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重构国际贸易秩序。美国法律霸权主义的重要体现是长臂管辖权,这一管辖权严重违背“一个国家不应该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国际法原则。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但却在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开展一系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极具霸权主义且逆全球化。

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开展的“301调查”“232调查”直接绕开了WTO规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罔顾大国的道义,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挥舞关税大棒威胁中国。美国政府在越来越难以通过改变WTO等多边框架规则来追寻自身利益的大环境下,倾向于发展新的区域联盟,以最终取代现有的国际多边框架和重新规制。

第二,运用金融手段极限施压。美国给竞争者设置了一道红线,一旦某个国家达到了红线,美国便会采取遏制措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对日本施压要求签署“广岛协定”,再加上日本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股市和住宅市场的泡沫破灭,使得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实现巨大的飞跃,但却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美国希望利用贸易摩擦加剧这些问题,并期望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

首先,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资本通过加息、减税、贸易摩擦等方式进行资本回流,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缩水,造成中国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以及许多高杠杆企业破产。其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一方面会造成中国的输入性通胀,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企业海外订单大幅度缩水,国际间的成本转移受到较大阻力,利润空间较少^[11]。最后,美国意图使中国迫于压力而选择错误的货币政策,继而导致企业的资本链断裂,从而引发一场连锁反应的经济危机,就像20世纪的日本一样。这也是今年中国金融平台企业债务频频违约、P2P头寸频频爆仓的根本原因。

第三,全面挑起“知识产权争端”并开启双边“技术冷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知识所有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成为一项法律权利,而且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和先进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的重要工具。此外,知识所有权保护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它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未来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知识所有权不仅将成为贸易磋商的强大杠杆,更重要的是将成为双边、多边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规则。因此,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应在“赛马场”设置屏障,并灵活运用知识所有权规则,谋求更大利润。

美国把各种知识所有权规制与其国内经济贸易法规相结合,以此来维护国家利益。2018年的中兴事件和随后的华为案一直受到国内外密切关注。据悉,华为公司由于芯片技术受限,2019年每季度需向高通支付1.5亿美元的技术许可费。实际上,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国内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销售额三个要素,美国在中美贸易业务中获得的净利润要远高于中国。另外,美国借“301调查”制裁中国企业,限制本国企业转让技术及向中国投资,一方面是为了运用知识所有权规则与国内相关经贸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则是焦虑自身在高新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降低^[12-13]。

第四,随意提升进口商品关税并升级“关税战”。特朗普一直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太满意”,因而他不断通过关税手段,谋求达到他所谓的“公平贸易”。尤其是针对贸易逆差最大的中国,以各种借口频繁地挑起“关税战”。如前述,2018年3月8日,特朗普签署关税法令,认定从中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决定对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进行全面征税,税率分别为25%和10%;同年3月23日,美国USTR又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4月4日,美国USTR发布涉及500亿美元,1300个单独关税项目的进口产品惩罚关税(25%)清单,以此来针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6月16日,美国宣布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其中第一部分约340亿美元中国商品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汽车零件等高科技领域,并于2018年7月6日起实施。而在6月18日,特朗普就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反击,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8月1日,美国宣布拟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征税税率由10%提高至25%。

然而,从美国商务部2019年3月发布的数据看,美国2018年货物贸易逆差总额达8913亿美元,扩大了838亿美元,增幅达10.4%,与中国、欧盟、墨西哥、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处于逆差,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并没有减少其贸易逆差。显然,美国2018年货物贸易逆差反映的是美国与多个国家贸易失衡,这是一个多边问题。

第五,建立“实体名单”精准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出口和投资。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2018年8月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实体(8个实体和36个附

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很多研究机构。同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将华为、中兴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市场之外。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福建晋华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对其实行出口管制措施。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出台一份技术出口管制方案,拟管制14项涉及国家安全和前沿科技的技术出口,并就这一方案向公众征询意见。工业安全局通告称,针对军民两用技术和不敏感军事技术的出口,可通过“商业控制清单”等加以管制,进而维护国家安全。

2019年5月1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致投票反对中国移动于2011年向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同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这意味着华为购买美国的产品将会受到一定程度限制。5月20日,谷歌Alphabet宣布,为遵守美国政府的命令,暂停与华为公司部分商业往来。2019年6月29日在G20峰会上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政府同意解禁华为部分供货,但并未将华为从“不予许可”的“实体清单”中删除。

(三)实施地缘牵制战略

为了配合在经济方面对中国采取的打压措施,美国更是实施地缘牵制战略,从海陆空全方位阻挠中国的复兴进程。不仅在中国周边制造地区不稳定,而且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港独”,企图分化分裂中国。

第一,不满足“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印度—太平洋战略”(简称“印太战略”)。奥巴马政府接任后,在“巧实力”概念下调整战略选择,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目的有三:一是用多边同盟网络替代双边军事同盟,加强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秩序;二是离间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关系,迟滞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三是在不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的基

础上,直接锁住中国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

但是,中国却在压力和风险中迎难而上,抓住机遇,不断推动自身发展。中国的变化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在亚太战略的推进中夺去了美国人的利益,且指责中国想要利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另起炉灶,将美国排除在外,重塑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过软,对华遏制的效果欠佳,故上任后不久,正式宣布以“印太”替代传统的“亚太”地缘概念来界定美国亚洲战略框架中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区域。为了推动和实施这一战略,特朗普与日本、澳大利亚达成一致,同意印度加入,形成“印太战略”四国同盟,达成牵制中国的目的。特别是依托印度的作用,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根本不掩饰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它不仅把中国作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劲敌。“印太”概念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印、澳、日牵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而构筑的一种“震慑”,这种“战略威慑”不仅有利于美国培育盟友,而且有助于创建以美国为首的多层次战略联盟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网络,预防印太地区再次出现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并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性区块,试图重建美国主导格局下的强权均势^[14]。此外,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印太战略”构想和之后采取的举措,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第二,期望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经过断断续续五年的艰苦谈判,苏美双方最终于1987年12月8日签订了无限期有效的《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然而,2019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

规中程导弹。而且于8月18日下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尼古拉斯岛试射一枚常规陆基巡航导弹。更让人震惊的是美国新任防长埃斯珀称,美国希望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美国在任何一个国家部署该武器,世界都有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美国试射陆基巡航导弹已经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而在亚洲部署该武器,更会危及区内所有国家的安全。

第三,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在中国南海地区制造事端。在“印太战略”下,美国不断增加对中国南海纷争的干预。美国军队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行动”日益常态化,军事自由裁量权增加。关于南海问题,2014年,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题目为《海洋界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的书面声明,陈诉中国未能根据国际法澄清其与九段线有关的海洋主张,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强化军事存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2017年11月11日,特朗普在出访越南期间透露,他将帮助调解或仲裁中越之间的南海争端。事实上,他的意图是通过南海问题延缓中国的崛起,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为了实现包围中国的目的,美国甚至向越南转让了退役的军舰和武器,并授予相关的作战技术,大大增强了越南在南海争端中的军事实力。在2019年期间,美国军方侵入南海12海里内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军队部署也在加速。此外,随着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美国有了新的野心,驻韩美军开始考虑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提高了干涉中国南海问题的战略机动性。

第四,支持“台独”,破坏中国统一大业。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多次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于2018年3月至5月通过了牵涉中国台湾地区的5项法令,分别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离间台湾地区与大陆的关系。之后,着手指派军舰横穿台湾海峡,在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等。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尔·施赖弗等人公开宣布,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众议院在2019年5月7日通过了所谓的《2019年台湾保证法案》,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黑暗阴谋。一系列军事活动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诱发了中美间日益强烈的地缘摩擦。蔡英文当局与美国政府“一唱一和”,鼓吹“台独”,公开挑衅“一个中国”的底线。“台独”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恃无恐,除了在岛内兴风作浪,还插手香港事务,庇护“乱港”分子。

第五,支持“港独”,触碰“一国两制”底线。自2009年,美国进一步推行“亚太战略”,其借助香港牵制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部分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利用香港问题,通过支持或操纵“港独”分子,给中国制造麻烦,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以资金方式支持“港独”分子在香港进行非法游行、制造街头暴力事件、攻击警察、殴打记者、占领机场、冲击中联办、污损国徽等,公然挑衅中国国家主权。美国先后在众议院、参议院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犯罪行为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触碰“一国两制”底线,使香港全社会陷入动荡之中。美国的介入不仅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推动香港问题的国际化,而且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提出挑战,危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动摇投资者信心。

第六,拿“涉疆”问题做文章,给中国内政添乱。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依法打击暴恐活动和去极端化工作,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受到了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而2019年12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却通过所谓的《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这显然是美国企图利用“涉疆”问题来挑拨中国民族关系,引发中国内乱,破坏新疆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等。

(四)推进舆论战污蔑与攻击中国

第一,煽动美国国内群众反华。美国在给中国极限施压的同时也在担心国内民众受到中国的“侵蚀”。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渲染中国在干涉美国内政,欲使国内民众感到恐慌。美国副总统伯恩斯先生的《哈德逊演讲》一文,其核心内容是指责中国政治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政策制定者还可能会为了争取国内支持,重塑政治共识,大肆传播中国统治世界的威胁论,以推动国内外各种战略的实施。在大众传媒乃至社交媒体上,美国媒体通过污蔑中国是导致美国产业工人大量失业之根源的系列扭曲报道,混淆公众视线,迎合美国民粹主义潮流。而特朗普政府通过推特宣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至上、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企业回流等观念,让美国产业工人非常欣慰,更是激发了美国民粹主义。

第二,全面攻击中国意识形态。特朗普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民主国家”,并造谣中国有一个未经宣布的“百年马拉松战略”,用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美国针对中国共产党及我国的国家体制机制改革,批评中国的“政治回归”和“独裁统治”,以引起美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为削弱中国与邻国之间的信任,破坏合作关系,诬陷中国通过战略部署试图将南海规划为自己的“内海”,建立古代帝王统治的朝贡体制;从理论上否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夸大其造成债务陷阱的可能性;将中国新闻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机构”,严格限制其活动等。

(五)实施文化限制

第一,提高签证审核门槛。教育部 2019 年第 1 号留学预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对中方留学人员正常赴美学习或在美顺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在 2019 年 5 月 14 日提出一项法案,对所有想要前往美国学习和学术交流的中国公民,只要是研究课题在美国的“商业管制列表”里,签证官会先咨询“安

全意见”,使得申请人的材料被寄去华盛顿,做一些合乎国家安全考虑的额外的审查,同时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务院停止向中国军方相关人员发放学生签证和交流访问签证,并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施加压力,要求其效仿。

第二,管控中美间正常的学术和社会交往。历史上一直具有高度竞争和危机意识的美国文化和社会对中国在科技上的进步高度警惕和紧张。自特朗普上台后,以政治渗透为借口,对中国在美国创设孔子学院提出质疑,并拟通过立法限制中美之间的一些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收紧与中国在科技、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交流活动和人员往来,将众多中国学者和留学人员排除在与高科技相关的研究、学习领域之外,甚至围猎高科技企业及高管。

四、中国应对对策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使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以对华为和中兴通讯“断供”为标志的科技战,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注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美国政府频繁的“退群”行为开启了逆全球化道路,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巨大影响。

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其本质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抬头,暴露出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的焦虑,反映了美国想要扭转国际经济地位下降趋势、制衡中国发展的战略考量。对此,中国应对思路如下。

(一)以更高质量的改革开放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面对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国要保持高度清醒和强大自制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

资、稳预期”等各项工作,稳定市场和社会预期,增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底气,以不变应万变。一方面,对内要全面深化改革,在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确保经济稳定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对外要保持开放发展的坚定决心,进一步放宽国内市场准入,健全外汇法律体系,优化投资环境,留住原有资本的同时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中国要坚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利用全球资源与国际市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二)以推进高质量发展来夯实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物质基础

中国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美国存在的巨大差距,特别是中国在技术研发领域存在明显短板。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企图从价值链高端入手对中国企业实行“技术断供”来遏制中国崛起,客观上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形成倒逼机制,催化中国创新体制改革、中国企业创新提档升级^[15]。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极大阻碍了中国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发展,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完善自主创新和经营管理体系,苦练内功,锤炼核心竞争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需要果断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逐步形成以自主研发与创新为立足点的新型发展模式。首先,要调整研发投入结构,改变以往重基础应用研究轻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大幅度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度,打牢基础研究根基,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与技术升级的连接渠道,为推动产业创新提供持续潜在动力。其次,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国际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国家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行业的投资力度,以基础研究为根基释放市场活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最后,要正确认识制造业及其转型升级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制造业

转型升级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在高中低端制造业均有布局,但是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尚未发展到与美国相匹敌,因此,要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价值链理论有机结合,根据中国的禀赋特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三)以谋求更深入的中美合作应对美国政府的“脱钩”与对抗

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同时,额外的关税负担也会给美国农业、科技产业等发展带来较大负面效应。40年来,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中美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联结体,“脱钩”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扰乱世界经济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中美经济和战略“脱钩”的格局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脱钩”是政策趋向,中国将在未来面对一个更加强硬的美国。

但是,这种趋向并不意味着中美不再合作,未来中美的互动将是竞争与合作的矛盾统一体。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供应链和配套优势明显,并且拥有规模庞大的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美国则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超群的创新能力和高度发达的服务业。中美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高度互补的经贸关系。基于中美两国经济和政治深入交往的基础,要进一步加强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以中美共同利益为突破点,努力保持并扩大双边经贸的互补性,谋求更深入的中美合作。

近年来,中美能源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双方互补性增强,加大与美国的能源贸易合作是缩小美中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一,中美能源贸易起点基数低、发展时间短,未来能源贸易合作潜力空间巨大。利用扩大中美能源合作的同时,要鼓励中国能源企业与美国能源企业构建“利益共同体”,建立长期友好经贸合作,开拓能源贸易合作市场。尽管在诸如经贸、科技等领域中美竞争愈加激烈,但在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内,

中美可以展开密切合作,如国际金融安全、国际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可以凭借自身逐步增强的全球影响力,以“中国姿态”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16]。

(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联合更多的力量来推进新经济全球化

美国四处挑起贸易战致使全球经贸摩擦骤增,中国应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利用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进一步凝聚国际国内力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携手推进新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亚洲没有统一的区域贸易协定,一直由美国充当主导者,“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弥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失衡,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形成亚洲区域统一大市场,打破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增强亚洲国家整体竞争力。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损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应抓住时机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深度挖掘利益交汇点,共建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与规则。

尽管美国政府力图阻碍“一带一路”倡议,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经过多年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已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量快速上升,金融发展与合作取得显著进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使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作为世界自由贸易的支柱国家,美国基于“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在全球起到消极示范作用,“逆全球化”思潮在世界范围抬头,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合作,而“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主张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全球化目标,高度契合各国对合作共赢的期盼,有利于促进世界和谐,反映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

针对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摩擦而采取的措施,中国应从战略上捋清美国的真实意图,坚定

本国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对美国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从挑战中抓住机遇,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好与美国长期博弈的准备。

[参考文献]

- [1] 陈继勇.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72-81.
- [2] 郭可为.中美贸易战:动机分析与情景推演[J].国际经济合作,2018(5):18-24.
- [3] 黄泽先.中美贸易冲突非对称冲击及中国的战略策应[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2-83.
- [4] 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5):21-37,155-156.
- [5] K M Campbell, E Rath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J].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8, 97(2):60-70.
- [6] 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J].国际问题研究,2018(3):80-93.
- [7]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J].美国研究,2018(4):51-74,6-7.
- [8]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 Washington, D.C., 2017.
- [9] 刘建江.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三维成因[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2-90.
- [10] 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J].美国研究,2018(4):75-96,7.
- [11] 陈璋,周晓波.虚实相融的中美贸易摩擦——重重假象背后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J].上海经济研究,2018(12):116-124.
- [12] 沈国兵.“美国利益优先”战略背景下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风险及中国对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91-99.
- [13] 张幼文.中美贸易摩擦: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战略竞争[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10.
- [14] Phillip Coorey. Australia Mulls Rival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with US, Japan, India[J].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2018(18).
- [15] 袁阳丽,段胜峰,刘建江,等.新时代贸易强国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1-90.
- [16] 刘建江,胡悦,李喜梅.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特征及影响研究[J].商学研究,2020(1):15-25.